

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逻辑

——兼论我国农村金融文化的培育路径

董昀

「摘要」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形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金融强国战略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深入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相结合，构筑起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价值内核：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农村金融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新征程，要发挥党的领导制度优势，强化思想引领和价值观培育，用好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优化金融生态，将现代金融元素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有机融合，在农村金融领域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关键词」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第二个结合”；农村金融；金融文化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812 (2026) 01-0017-13

DOI:10.16127/j.cnki.issn1003-1812.20251225.001

一、引言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灵魂，金融文化是支撑一国金融发展的重要软实力。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要坚持法治和德治相结合，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¹。这一重要论断表明，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我国金融发展总体方略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价值。金融系统要深刻认识金融文化培育工作的重大现实意义，准确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实践逻辑，推动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培育工作走深走实。这是筑牢金融强国的文化根基，使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的必然选择。

本文以我国已迈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为现实背景，以农村金融文化建设为典型场景，着力探讨四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基础性问题：其一，着眼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为什么要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其二，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我国基本国情，培育金融文化的关键是什么？其三，应当培育什么样的金融文化，其核心要义是什么？其四，农村金融具有鲜明的普惠性，既是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金融价值取向的重要领域，也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主阵地之一，应当沿着什么样的实践路径在农村金融领域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在回答上述问题的过程中，本文力图在探索中国特

作者简介：董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基金项目：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阐释工程2025年度重点项目“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重要论述体系化学理化研究”（编号：2025XYZD01）、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科建设“登峰战略”资助计划优势学科“金融与发展”（编号：DF2023YS28）的研究成果。

色金融文化的实践逻辑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为我国学术界和金融界系统把握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历史、理论和实践逻辑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大现实意义

国家兴衰,金融有责。能否拥有强大的金融体系,关乎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新形势下,金融成为大国博弈的必争之地,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对强国建设的作用更加凸显。面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已成为金融助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

放眼全球,世界各国的金融发展道路无一不潜移默化地受到自身文化传统的影响。例如,美国信奉个人主义价值观,强调通过个人奋斗、个人自我实践,追求个人价值的最终实现。美国文化推崇自由竞争,鼓励创新和冒险。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的金融发展模式由市场机制驱动,金融监管相对宽松,资本市场和投资银行业高度发达,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创新速率极快,金融产品与实体经济越来越疏远。强大的金融创新活力在带来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埋下了金融危机的种子。

又如,德国文化讲究秩序感,注重平衡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经济与金融的关系,致力于追求和维护稳定的秩序。德国的金融发展模式倡导在自由竞争机制下开展合作。在德国,每家企业可以选择一家主办银行,主办银行既是企业的主要融资提供者,又参与到企业的公司治理活动中来。银行可以获取许多企业的“软信息”,有效解决银行与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即便在经济下行周期中,德国的银行也能做到逆周期放贷。德国的金融体系一方面可以有效熨平周期性波动、防控金融风险,另一方面也存在金融创新不活跃、资本市场不发达等短板。

此外,还有对金融体系进行强力政府干预的日韩模式、强调风险共担和注重包容性的北欧模式、禁止收取利息的伊斯兰金融等,它们无一例外都植根于自身的文化传统和市场经济模式(董昀,2025)。在不同的文化滋养下形成的各类金融发展道路可谓“各美其美”,都有独特的比较优势,决定着本国金融发展的立足点和大方向,当然也有各自的局限性。

再将视线转回国内。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两个结合”这一重大理论观点后,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其科学内涵进行了总结和阐述,之后又一次强调“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并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²。对于金融发展而言亦是如此。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同当代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努力把握新时代金融发展规律,持续推进我国金融事业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奋力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³。这条道路之所以行得通、走得稳,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要继续发挥制度优势,更加彰显中国特色,加快实现金融强国目标,就必须拓展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根基,培育具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从而建立起中国金融发展的文

化主体性，形成引领金融强国建设的强大文化力量。

进一步聚焦新征程上的中国金融发展。我们之所以要立足中国具体实际，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为了解决中国金融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指出：“金融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相互交织、相互影响，有的还很突出，经济金融风险隐患仍然较多，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质效不高，金融乱象和腐败问题屡禁不止，金融监管和治理能力薄弱”⁴。这些现象说明，我国金融发展质量还不高，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还不足，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防控风险的能力还不强。

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一个深层次原因来自文化：一分部署，九分落实，金融工作归根到底要靠金融人才队伍去落实去推动。迄今为止，我国一些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秉持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还完全不能适应金融强国建设和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金融是什么”“金融有什么用”“为什么干金融”“怎么干金融”等一系列核心问题上还存在认知偏差。这就导致了金融活动的行为准则和行事效果可能偏离金融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带来各种金融乱象和风险隐患。

文化的重要功能在于塑造价值观、滋养心灵、涵养智慧。在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要推动我国金融实现由大到强的历史性转变，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在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群体中培育一套既彰显深厚文明积淀，又适应新时代新要求的价值系统，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的、健康向上的金融文化。只有这样才能正本清源，在规模庞大的金融队伍当中树立正确的金融观，让大家真正搞清楚应当“怎么看金融”“怎么干金融”，从而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夯实文化根基、熔铸强大魂魄、凝聚基本共识、确立行为准则。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诚实守信、以义取利、稳健审慎、守正创新、依法合规，守好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根和魂”⁵。

三、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关键在于“两个结合”

（一）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应坚持“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具有自我发展的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而全面地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形成了许多与金融有关的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如诚信观、义利观、风险观、创新观、法治观，等等。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拓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必然要在尊重现代金融发展规律和吸收外来文化有益成分的基础上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逐步培育能够有力支撑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

作为一个形成于新时代的崭新文化生命体，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显著特色在于，它既广泛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遵循现代金融发展一般规律，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和智慧，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能够为推进我国的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连绵不绝的内生动力，不断巩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主体性。

循着这一分析思路前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之所以具有中国特色，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博采百家之长，基于辩

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构建了包括货币、信用、银行、资本等范畴的金融理论,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和现代的金融文明带到中国,以强大的真理力量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的丰富多彩的金融创新、金融思想和金融哲学,推动中国金融理论与实践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由多元文化汇聚而成的,具有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巨大包容性,为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中国化提供了巨大的创新空间,赋予当代中国金融发展以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

需要看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与之相对应,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在中华大地上生长起来的文化生命体,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关键在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经由“第二个结合”培育形成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长期滋养,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开拓本国金融发展道路的伟大实践,集中体现当代中国金融的文化内涵、时代风貌和独特价值。

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有三个要点必须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是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根脉,根脉与魂脉的结合是关键。

第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蕴含在其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灵魂和命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的理论体系,贯穿于其中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我们认识金融规律、做好金融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方法手段。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将其中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灵魂和指针。

尤为重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辩证分析,凸显了文化对金融的重要作用。一方面,“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⁶,文化的培育需要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也离不开金融血脉的支撑;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社会意识具有自身的发展形式和发展规律,对社会存在也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物质力量,影响经济社会活动。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反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⁷。这就从理论逻辑上深刻揭示了文化对经济运行的重要影响力。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既有利于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又可从价值观、信念和行为规范等层面为新时代的金融发展提供深沉而持久的力量。

第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根基和血脉。马克思主义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恩格斯曾说过:“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⁸。在一切世界文明语言中落地生根,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时代化。正是经历了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得以吸收借鉴各国各民族思想文化体系中的一切有益成分,才具有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⁹。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发展道路,是由它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对金融领域而言同样如此。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只有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当代中国的金融发展,才能真正理解其中蕴含的中国特色。从西周时期的国家宏观调控机构“泉府”到北宋时期的世

界最早纸币“交子”，从管子的轻重理论到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说，中国古代货币金融实践和货币金融思想曾长期领先世界，这些宝贵探索的背后还有中国传统哲学观和方法论的深层次支撑。所有这些传统思想文化资源至今仍在滋养着中国人，影响着中国金融行业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只有立足中国具体实际，植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沃土，才能把握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大逻辑，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在中国大地上根深叶茂。

第三，魂脉与根脉的结合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关键一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广大金融从业者和金融消费者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深刻的化学反应产生崭新的文化生命体。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将系统观念、辩证思维和人民性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中，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

“第二个结合”使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金融发展贯通起来，实现了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从义利兼顾到以义取利、从慎其终始到稳健审慎等一系列创造性转化。经由“第二个结合”形成的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构成了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文化形态，为新时代的金融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和丰厚滋养。

（二）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五要五不”

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是经由“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开拓出来的。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必须以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当中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根本遵循。以此为基础，我们要在金融系统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出一套与之相契合的价值系统和工作方法，构建既符合国家战略需要又尊重现代金融发展规律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行为准则。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首次提出“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并将其概括为“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¹⁰。作为一个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它清晰勾勒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引导金融行业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掌握科学的方法论，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培育指明了愿景和方向。

其一，“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旨在引导金融行业坚持契约精神，恪守市场规则，筑牢金融活动的信用基石。其二，“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旨在引导金融行业正确处理金融的功能性和盈利性之间的关系，使盈利服从功能发挥，树立正确的行为目标。其三，“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旨在引导金融行业正确处理短期和长期的关系，既看当下，更看长远，树立以稳中求进为总基调的正确经营观、业绩观和风险观。其四，“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旨在引导金融行业坚持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宗旨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通过金融创新发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注入连绵不绝的动力源泉和金融活水。其五，“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旨在用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办法划定金融活动的禁区，以强大的金融监管和健全的金融法治促使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严格遵纪守法，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概言之，“五要五不”是一套系统全面、导向清晰的价值系统。一方面用“五要”树立起正确的价值取向，另一方面用“五不”鲜明标识出错误的行为方式，分别从筑牢信用基石、找准目标定位、坚持正确基调、激活动力源泉、严守法规底线五个维度入手，引导金融系统牢记“金融是‘国之大者’，关系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全局”的战略定位，以厚重金融文化持续滋养金融行业发展。

如果我们能够朝着上述目标完成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战略任务，将会在金融行业树立正确价值导向，凝聚行业共识，增强系统观念，激励担当作为，强化风险意识，从而潜移默化地守好魂脉，筑牢根脉，提升金融队伍的纯洁性、专业性和战斗力，确保我们的金融强国建设事业沿着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阔步前进。

四、“五要五不”的丰富内涵与鲜明特色

“五要五不”的丰富内涵既熔铸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更彰显出新时代中国金融的鲜明特色，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中推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要使“五要五不”发挥更大作用，还要积极推进中国自主的金融学知识体系建设，将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有机融入金融学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使新时代的中国金融学知识体系真正具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中国神韵”，体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下面以“第二个结合”为主线对中国特色金融文化五个方面的核心要义分别加以分析。

(一)“诚实守信，不逾越底线”筑牢信用基石

现代信用大致上是承诺在将来某个时点以支付一定报酬为条件开展的资本融通活动，它与“借贷”“债”等概念紧密相连，是以收回为条件的付出，或者说以归还为义务的取得。大体上说，金融涵盖的范围，就是货币收支当中与信用关系联结的部分(黄达，1997)，因此也可以说，信用构成了货币金融活动的基础与核心。

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将信用体系视为复杂的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当中的最具基础性的制度安排之一，信用创造就是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活动。除了组织货币供给和快速扩张信用之外，现代市场经济中信用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是推动资金实现跨主体转移，把货币收入转化为营运性资本，进而发挥媒介作用，引导各类实体资源的优化配置。如果没有金融与信用的“穿针引线”，市场经济就将失去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巨大优势。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对信用的作用予以高度评价：“信用制度的必然形成，以便对利润率的平均化或这个平均化运动起中介作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就是建立在这个运动之上”¹¹。

再看古代中国的信用观。早在先秦时期，重信守诺就成为诸子百家共同推崇的核心价值，“民无信不立”“言必信，行必果”“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等名言流传至今。从古至今，“一诺千金”始终是商业活动中的核心价值导向，有学者的考证发现，在明清商人的伦理观当中，“诚信”“不欺”是居于中心位置的内核之一(余英时，2014)。这一时期的钱庄和票号都极为看重自身的信誉。钱庄以信用贷款为主，既用“跑街”的方式来开展贴近实际的信用调查，也强调加强钱庄与客户之间的私人情感来增加信任。而山西票号则更是由于经营业绩和口碑上佳，被人赞誉为“山右巨商，所立票号，法至精密，人尤敦朴，信用最著”。传统中国的信用体系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但毕竟是以家族为中心，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中生长出来的。这种人格化交易将经济活动范围限制在熟人圈里，进行重复的面对面交易，约束

力量主要是强度较低的个人道德自律。这就限制了金融市场交易范围的扩张，阻碍了社会再生产的扩大。

马克思刻画现代市场经济当中的交易是非人格化的，社会信用成为维系市场经济中各主体之间关系的重要纽带，金融资源的大范围流通交易靠的就是信用商誉。马克思主义信用观激活了中国传统的诚信观，使国人认识到现代信用体系对拓展市场交易范围的巨大作用，并将其与中华文明孕育发展了数千年的信用观有机融合，初步形成与国民经济体系各方面各环节深度融合的社会信用制度，特别是创造性地运用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信用推动国有金融机构在居民储蓄与企业部门之间发挥从储蓄到投资的关键转换功能，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动力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张杰，2017)。与此同时，随着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向纵深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等基础性制度安排逐步建立起来，坚持契约精神、恪守市场规则和职业操守的基本价值观已在金融系统初步确立，诚实守信业已成为我国市场运行的核心价值导向和金融活动的前提和基石。

(二) “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 确立行为目标

资本是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产要素。资本的逻辑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的资本扩张逻辑，任何资本都是逐利的，追求增殖的，具有天然的扩张性。如不对其加以引导和治理，将会陷入唯利是图的泥沼。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的唯利是图进行了深刻批判。马克思发现，为了逐利，生息资本脱离生产过程自行其是，“在生息资本上，资本关系取得了它的最表面和最富有拜物教性质的形式。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G-G'，是生产更多货币的货币，是没有在两极间起中介作用的过程而自行增殖的价值”¹²。20世纪初，列宁对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逐步形成的金融资本内涵进行了界定：“生产的集中；从集中生长起来的垄断；银行和工业日益融合或者说长合在一起，——这就是金融资本产生的历史和这一概念的内容”¹³。

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金融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浪潮，大大推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的金融化，这体现在银行业去管制化、金融业集中、机构投资者规模和范围的扩大、产品结构复杂、价格波动大、风险传递快等方面，全球金融资产与债务急剧扩大。现代金融资本体系也随之建立起来，涵盖银行、证券、保险、基金、投行等业态(张宇，2025)。于是，金融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形态。通过这种方式，资本获得了其最为纯粹的形式，即马克思刻画的情景：资本摆脱现实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越过“使用价值”阶段而直奔价值增殖(G-G')，“以钱生钱”。概言之，就是唯利是图。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不少学者对金融机构自私自利文化有强烈批评，认为“我们的银行机构缺乏美德，这是金融危机的根源”(斯基德尔斯基，2025)。换言之，近几十年来金融业欺诈行为有增无减，问题的根源是对金钱的贪婪，这种自私自利、唯利是图的银行文化正面临巨大挑战。与这种现实情况相对应，西方主流金融学只是把银行简单地视为金融中介，没有认识到金融机构作为货币创造者在经济体系中扮演的至关重要的角色(瑞安—柯林斯等，2022)，也就是忽略金融机构肩负的社会责任和对经济运行的重要作用。这样的主流金融学理论在面对金融危机时自然显得苍白无力。

再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和利。“学莫先于义利之辩”，义利之辩是贯穿中国古代思想史的中心议题。所谓“义”，是指个人品质中与他人、社会直接关联的德行，包含责任的要求，要求个人以对方为重，努力履行自己肩负的责任，实现对他人的义务，个人的利益要服从责任的要求(陈来，2024)。而关于利，

则强调取之有道,例如,《大学》中的“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意在表明不义之财必不长久,终将失去。

富民厚生、义利兼顾是古代中国社会的重要经济伦理主张,见利忘义一向为君子所不齿。宋明两代明确把“义、利”等同于“公、私”,强调“利公亦是义,义而私只是利”(钱穆,2025)。对“义”的强调使得“兼善天下”“利济苍生”成为中国古代金融活动的重要价值追求。这就要求金融从业者处理好义和利、公和私的关系,做到“功利体现于道义之中”。金融活动不仅要获取利润,实现商业价值,而且要在塑造社会伦理、协调人际关系、培育商业道德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努力实现义与利的兼顾和统一。

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对资本逐利性的深刻批判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富民厚生、义利兼顾伦理观结合起来,形成了指导我国金融活动的行为目标体系。那就是正确处理金融的功能性和盈利性之间的关系,做到以义取利,反对唯利是图,使盈利服从功能发挥。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做到以义取利,就是要求金融必须发挥好媒介交易、配置资源、发现价格、管理风险等基本功能,履行好社会责任,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维护高水平安全的进程中实现金融与经济、社会、环境共生共荣,实现金融业自身的发展壮大。

(三)“稳健审慎,不急功近利”明确行为基调

金融发展是一个系统的动态的过程。在开展金融工作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把握金融运行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联系和矛盾运动,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基本原理,而不能固化、神化某些具体结论。特别是不能被某些先验的假定影响,用片面、静态、机械的方法开展金融工作。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金融监管者对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的迷信带来了深刻的教训。经典货币金融学理论认为,银行不过是储蓄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中介,中央银行的适当货币政策可以确保金融稳定;市场可以自我纠错、自我监管,金融市场对风险的定价是正确的,政府无需干预。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上述思潮的影响下,金融市场被认为是有效率的市场,可以对风险进行正确定价。这就导致政府和监管机构放松对金融业的监管,把决定权交给自由市场中的金融机构,允许他们自行其是。在这种环境下,金融机构对按市场计价的会计方法和风险价值模型的准确性深信不疑,充斥着乐观和傲慢的情绪,普遍过度借贷,快速扩张。于是,眼前利益带来的诱惑盖过了对未来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担忧,导致投机盛行,欺诈行为不断。一旦度过繁荣期,人们面临的不确定性将急速上升,就可能带来难以估量的危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典型例证。

回到古代中国。中庸是儒家文化乃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概念。“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中庸着眼于推动矛盾双方的有机统一,强调事物发展的平衡与稳定。“允执厥中”“君子而时中”等中庸理念讲求通过把握好度来实现动态平衡,既不能墨守成规、封闭僵化,更不能急躁冒进、急功近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只有慎终如始、沉静稳重,摒弃轻率浮躁,不被眼前小利所惑,方可成大事。中国古代的商帮票号在经营中也把“将本求利”作为基本原则,注重保持资本金充足,避免盲目加杠杆。

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推进金融高质量发展,建设金融强国是一项长期事业,必须久久为功,稳扎稳打,积极而又审慎地推进。从微观上看,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等金融强国的关键核心要素都不是一夜之间可以形成的。因此,金融机构要借鉴古今中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保持战略定力,树立稳健审

慎的经营观，坚持稳中求进。具体地说，就是既看当下，更看长远，不贪图短期暴利，不超越承受能力而过度冒险，在稳住基本态势的前提下不断前进，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提供动力源泉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金融发展同样也需要创新驱动。不过，金融并不总是与实体经济保持一致，金融体系可能通过自我循环而自成体系，独立运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虚拟资本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分析，既展示了实体经济的根基地位，又揭示了金融脱离实体独立运动的倾向。马克思指出：“虚拟资本有它的独特的运动”¹⁴，这使得资本主义国家绕过生产过程而陷入直接获取利润的狂热。虚拟资本与实体资本关系的失衡一旦超出限度，就会导致经济危机。列宁也强调：“食利者阶层完完全全脱离了生产，给那种靠剥削几个海外国家和殖民地的劳动为生的整个国家打上了寄生性的烙印”¹⁵。

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变化进一步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判断。这期间，全球化和自由化浪潮带来了金融监管的持续放松和金融创新的狂飙突进。证券化导致负债链条不断拉长，全球各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越来越高，根据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的研究，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密度（金融交易占全部经济活动的比例）从1980年的70%上升到2011年的450%以上，尽管金融体系的规模越来越庞大，看起来更具创新性，但经济体系的运行并未变得更有效率（特纳，2021）。这种脱实向虚的行为导致了金融资源错配，难以持续，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中华民族自古就富有创新精神，中华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中国古代的货币金融创新发展一直围绕实体经济发展需要展开。无论是商周之际的金属铸币，还是唐朝中后期的飞钱；无论是北宋时期的交子，还是明清时期的钱庄和票号，都是植根于实体经济的货币金融创新，它们也都曾有力地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优化了要素资源配置，推动了实体经济发展。

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经济金融共生共荣”这一重大判断，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¹⁶。金融要牢牢守住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这个正道，搞清楚为谁服务，为什么创新。我们需要谨记，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发展是有其合理限度的，一旦超越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的限度，就会过犹不及，金融创新活动的进一步增加将会阻碍经济发展。只有守住了这个正道，金融创新才能转化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提升，从而促进经济金融共生共荣。

（五）“依法合规，不胡作非为”划定行为禁区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关键支撑，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时高度重视法律的作用，他在1879年《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文中指出：“先有交易，后来才由交易发展为法制……这种通过交换和在交换中才产生的实际关系，后来获得了契约这样的法的形式”¹⁷。这一重要而鲜明的论断揭示了市场交易、契约和法制之间休戚与共的紧密联系，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重要原理的具体表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一直有依法合规的思想理念。无论是《管子》中的“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还是《孟子》中的“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都体现了对规则、秩序和法律的高度重视。中国古代先贤认识到，在严格遵守法律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秩序是国家安定的基石。秦国在战国后期颁布的《金

布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货币法规，规定了秦国货币的制造、流通、交易、兑换等环节的行为准则和管理办法，确立了“秦半两”和特定形制布匹的法定货币地位。

在融通古今中外资源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金融的安全靠制度、活力在市场、秩序靠法治”¹⁸。法治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金融活动涉及复杂多样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信息不对称的特点，金融的创新发展不但需要激发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的创造力和积极性，还必须有完善的金融法律和市场规则体系来防止和惩戒各种伪创新、乱创新和胡作非为。在迈向金融强国的征程上，只有做到有法可依，有禁必止，违法必究，才能从根上确保金融创新和发展不偏离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的轨道，不偏离稳健审慎的总基调，避免脱实向虚，以金融体系的健康平稳运行助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五、关于积极培育我国农村金融文化的思考与建议

探寻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现实逻辑，至少应包括如下几个环节：首先是分析现实背景，理解其重大意义；然后是找寻培育路径，明确前进方向；接着是确立远景目标，擘画总体蓝图；最后是开展实践探索，形成操作方案。

如前文所述，积极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是新征程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内在要求，“第二个结合”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必由之路，在这条道路上探索形成的“五要五不”已勾勒出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核心要义和总体轮廓。为了完成对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现实逻辑的探索，我们还要继续以“第二个结合”为取向，探索在金融系统做到“五要五不”的具体操作方案。本部分以农村金融为典型场景，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索。

（一）农村金融是培育中国特色金融文化的重要阵地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是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要求，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农业基础稳固，农村和谐稳定，农民安居乐业，我国发展大局就有保障；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十五五”时期，我国将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所有这些目标任务的推进，都离不开资金的支撑。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健全财政优先保障、金融重点倾斜、社会积极参与的多元投入格局，确保乡村振兴投入力度不断增强”。这表明，只有以农村为主阵地，切实做好普惠金融大文章，才能确保金融向乡村振兴领域重点倾斜，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金融文化是金融发展的底层支柱，做好农村金融工作需要积极培育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文化。

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植根于农耕文明，没有土地和农业，人类就无法存活，文明也就无从谈起。古代中国以农为本、以农立国，农耕时代的劳动方式和生活方式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形成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离不开农耕文明的长期滋养。农耕文明塑造的精神世界中既有对当代金融发展有宝贵借鉴意义的精华部分，也有一些与时代要求不相适应的落后保守成分。

古代农耕文明中可资借鉴和汲取的经验智慧不胜枚举。例如，农业生产必须遵循气候、土壤等方面的自然规律，这使得古代中国人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这种观念基础上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有机主义哲学思想。又如，农业生产必须面对自然界的各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由此形成了稳健审慎的生产经营观和实事求是、尊重规律的务实理念。

而农耕文明中的一些局限性也不可忽视。例如，农村的相对封闭和熟人社会特征导致信用扩张范围有限，农村的可抵押物较少和产权保护强度不足导致农村金融不易做到以义取利，涉农中小金融机构可持续发展能力差、创新能力不足，宗族观念强和法治教育不足导致农村的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薄弱，等等。

推进农业强国建设和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大力弘扬农耕文明孕育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将其中的精华部分与现代金融文明元素有机融合，探索在农村金融活动中做到“五要五不”的可行路径。

（二）探索培育新时代农村金融文化的实践路径

第一，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多措并举推进农村金融文化建设。涉农金融机构和金融从业者要深刻认识到，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以实现“五要五不”为战略目标，采取文化培育、技术进步和改革赋能三管齐下的办法推进农村金融文化建设。首先，坚持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加强金融机构党的建设，强化思想政治引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核心价值观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农村金融人才队伍，把中国特色金融文化全面融入机构运营和业务发展的各个环节。其次，要用好数字技术，盘活数据要素，深化农村金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农村金融文化培育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最后，要以改革赋能，在市场化法治化轨道上推进金融体制改革，为农村金融文化的培育提供适宜的生态环境。

第二，以“诚实守信”为基石，完善新时代农村信用体系。增强农村金融体系普惠性的一个难点是，农村信用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现代信用文化尚未深入人心。要继续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信用文化培育提供机制保障。首先，扩大征信系统客户和数据覆盖范围，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加强不同机构之间的数据共享，让数据资源充分流动。其次，完善“信用户”“信用村”“信用乡（镇）”创建评定制度，做好农户信息收集、建档、评级、授信、公示等基础工作，精准识别各类农村经济主体信用状况，不断优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最后，引导金融机构运用新技术充分挖掘农村经济主体的信用价值，在信贷、贴息、服务等多个层面为信用状况好的主体提供支持。

第三，以“以义取利”为目标，以金融高质量发展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三农”领域是以往的传统金融不能有效提供服务的领域。在农村金融活动中践行“义”就是要发挥金融体系在资源动员、资源配置、风险管理等方面的关键作用，改变农村金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状，使过去不能充分获得金融服务的农村人群可以平等而有尊严地享受公平的金融服务。做到以义取利，就是要在“普”“惠”和“商业可持续”之间权衡取舍，既要以较低的成本向广大涉农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又不偏离商业可持续的要求。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通过市场化手段为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业务提供政策支持，如提供结构性货币政策、财税政策、差异化监管政策等支持，提高对金融机构开展农村金融业务的激励；同时，政府可以通过改革消除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中的体制机制障碍，提高消费者金融素养，帮助金融机构降低运营成本和风险成本。

第四，以“稳健审慎”为基调，推动农村金融发展行稳致远。在农村金融机构培育稳健审慎的经营观，

需要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加强制度建设,优化金融结构。首先,以稳立大局,完善涉农金融机构的现代化风险管理体系,加强对重点领域的风险防范,对潜在风险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暴露、早处置,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其次,兼顾农村金融特殊性,适当提高对金融机构开展农村普惠金融业务的风险容忍度,对不良贷款超过一定限额的金融业务提供必要的风险补偿和支持政策,提高金融机构积极性。再次,健全评价考核体系,优化涉农普惠金融业务常态化考核指标,完善统计指标体系,更好地反映和评估金融机构涉农普惠金融服务成效。最后,引导各类金融机构找准自身定位,既对部分大银行在农村地区开展普惠金融业务实施窗口指导,又明确中小银行支农支小、立足普惠的发展定位,实现协同配合、高效分工,做到既稳且进。

第五,以“守正创新”为动力,科技赋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在农村金融领域做到守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金融服务人民大众和乡村振兴,防止非法集资和伪创新、乱创新。在这一前提下推进创新,就要运用科技手段充分激发蕴藏于金融从业者和人民大众之中的活力与创造力。重点是引导涉农金融机构利用科技手段对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模式、业务流程等进行改造。不仅要金融机构的科技研发投入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而且要引导和规范大型金融机构或外部科技公司对涉农中小金融机构的科技输出,借助外部科技力量对中小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进行赋能。同时,由监管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培训,提高金融机构特别是涉农中小金融机构应用金融科技的能力。此外,要为农村中小金融机构物理网点改造提供指引,降低网点人力和运营成本;引导和鼓励中小金融机构实现线上渠道与线下渠道的融合发展,更好地发挥物理网点的作用。

第六,以“依法合规”为底线,健全农村金融法律法规体系。农村是法治建设相对薄弱的区域,做到依法合规,杜绝胡作非为,需要在立法、执法和普法等环节协同发力,全面提高法治意识和法治思维。首先,加快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立法,切实保护农村普惠群体消费者权益。其次,严把金融市场准入关,确保所有进入金融市场的机构和个人都符合法律法规所规范的条件,严格限制不合规主体进入农村金融市场,从源头上减少金融风险。最后,加大对农村地区的金融法规和金融知识宣传力度,既包括个人征信、银行卡安全、支付工具使用、存款保险、证券期货和投资理财等方面的常用基础金融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也包括一些新的金融投资和防诈骗知识,增强金融消费者法治意识。■

(责任编辑:贾宗敏)

注释:

- ¹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171页。
- ²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 ³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11-01(1)。
- ⁴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人民日报》,2023-11-01(1)。
- ⁵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171页。
- ⁶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68页。
- ⁷ 《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5页。
- ⁸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65页。
- ⁹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 ¹⁰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推动我国金融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01-17(1)。

- ¹¹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93页。
- ¹² 《资本论》(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40页。
- ¹³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13页。
- ¹⁴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27页。
- ¹⁵ 《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661页。
- ¹⁶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人民日报》,2019-02-24(1)。
- ¹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22-423页。
- ¹⁸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15页。

参考文献:

- [1]董昀.中国特色金融文化[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
- [2]黄达.宏观调控与货币供给[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3]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M].北京:九州出版社,2014.
- [4]张杰.为什么选择国有金融制度[J].金融评论,2017(1):1-15,123.
- [5]张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理论再认识[J].中国社会科学,2025(8):22-41,204-205.
- [6][英]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货币与政府:对主流经济学的挑战[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5.
- [7][英]乔希·瑞安-柯林斯,理查德·沃纳,安德鲁·杰克逊,等.货币从哪里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
- [8]陈来.中国哲学的精神与境界[M].北京:华文出版社,2024.
- [9]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5.
- [10][英]阿代尔·特纳.债务与魔鬼:货币、信贷和全球金融体系重建[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1.

On the Practical Logic of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ncurrently Discussing the Cultivation Path of Rural Financial Culture in China

DONG Yun

Abstract: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presents the cultural form of the path to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ctively cultivating this culture is an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the strategy to build China into a financial powerhouse. Fostering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ies in utilizing the principle of “Two Integrations”, especially “the Second Integration”, so as to draw on the essence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combination of the soul of Marxism and the roots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forms the value core of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onesty and trustworthiness, pursuing profit with righteousness, prudence and stability, maintaining integrity while innovating, and compliance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Rural finance is a vital part of China’s financial system. Moving forward on the new journey, it is essential to leverage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Party’s leadership, strengthen ideological guidance and value cultivation, utiliz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data elements, optimize the financial ecosystem, and organically integrate modern financial elements with the essence of China’s fin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actively cultivate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field of rural finance.

Key Words: Financial Cultur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Path to Financial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Second Integration”; Rural Finance; Financial Culture